

高 邑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高邑县委员会

顾问

石贵田

主编

刘仲琦

编辑

冯建民 贾瑞卿 张忠良

封面设计

郭德民

封面题字

籍文书

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把我县文史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代序)

杨振山

我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高邑文史资料》第二辑，继第一辑之后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全书共选辑文章二十一篇，约计十二余万字。涉及面比较广，有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及历史人物等方面的内容。该书内容丰富，叙事清楚，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是一部珍贵的史料。是对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在培养人们的革命理想、社会风尚、道德、情操等方面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生前倡导的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文化事业，是各级政协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任务，也是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周恩来总理曾说过：“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这就为我们指明了文史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只有了解我们民族的昨天，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和展望明天。古人曾说过：“亡史之罪胜

于亡国”。意思是国亡可复，史亡难补。由此可以看到，抓好文史资料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那些知道情况的人，如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如不抓紧，许多重要的史料就会被埋没，因此对文史资料要抢救。

文史资料征集范围，上限1898年戊戌变法，下至1966年文革前，对六十八年间我县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史料及地方掌故、风俗人情、三教九流、名人轶事等内容均可收集和整理。文史资料工作是当代人写当代的事，所以亲历、亲见、亲闻是文史资料的特色。文史资料必须坚持“存真求实”，忠于历史，秉笔直书，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对于历史人物，不论他们的阶级地位，党派关系、政治态度，世界观和学术观点如何，只要他们在我县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我们都要积极征集。

文史资料在史林独树一帜，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它以独特的内容走进了史学的殿堂，开辟了史料集累和研究的新领域。文史资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戊戌变法以来的社会面貌，为研究我县近代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

为使我县文史资料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并继续推向前进，县政协把文史资料工作列入政协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了文史资料工作部门，负责收集整理各种史料。文史资料工作不单是几个人的事，是一项社会性工作，要广泛发动群众，尤其是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医生、老工商业者、老艺人等，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投入抢救史料这一工作，让他们回忆、整理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县政

协要加强文史资料队伍的自身建设，文史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努力作一个合格的历史资料工作者。

我希望全县文史资料工作者振奋精神，同力合作，在文史资料广阔领域中施展自己的才干，为开创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把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继续推向前进而奋斗。

一九九〇年九月

目 录

著名画家赵枫川	赵连印 (1)
我的叔父赵枫川先生	赵乃琛 (5)
昔日对高邑县教育事业有贡献的郭乃岑	
.....	马宗援 马宗泽 (17)
回忆我的伯父郭乃岑	郭广仁 (22)
一生从事测绘事业的郭采辰	郭育英 (25)
我县近代三位知名中医	刘宗甫 (27)
老药工周茂香	刘宗甫 (34)
汉奸张权本在高邑	刘宗甫 孔令州 郭士军 (36)
贪官高遇甲	刘宗甫 郭士军 (41)
解放战争时期我县人民对敌斗争片断	刘仲琦 (42)
记我县军民抗日斗争的几个故事	刘宗甫 (47)
高元赞联合抗日政府县长马林脱险记	郭广仁 (56)
五二年大雹灾	刘仲琦 (58)
一九六三年特大洪水灾害	刘仲琦 (62)
高邑人民对抗地震次生灾害的斗争	刘宗甫 (76)
高邑民俗纵横谈	刘宗甫 (79)
高邑民间业余戏班	县志办 (131)
贾老维的经商之道	贾瑞卿 (143)
高邑历代名人	刘仲琦 (147)
高邑政协简史	刘仲琦 (175)
唐代陈善墓志范序碑初考	冀三辰 (184)

著名画家赵枫川

赵 连 印

赵枫川，我国著名画家、书法家。笔名木风。河北省高邑县东驿头村人。生于1915年4月13日，卒于1988年10月1日，享年73岁。

赵枫川出生在劳动农民家庭，自幼在家乡小学读书，爱好绘画。十七岁时考入高邑县乡村师范，学习期间甚爱美术画艺超群。1934年经老师推荐考入北平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在校学习期间，受到著名画家吴镜汀的热情指导，以优异成绩毕业。

赵枫川自青年时代起，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立志以身许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枫川怀着抗日救国的革命激情，毅然投笔从戎，于1938年7月投奔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革命队伍，在冀西第一专员公署民教科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经过残酷战争的考验和锻炼，赵枫川于1938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调《冀西公报》社，编绘油印画报《山川画报》。1941年调太行区文联，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在残酷战争环境和艰苦工作、生活的条件下，他以画笔为武器，积极宣传和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其间他创作了许多壁画，宣传画和年

画，反映战争年代战士群众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团结抗战的精神风貌。1944年他为太行区第一次群英会所画的一套题为《生产救灾》的连环画，对教育人民、激励人民，团结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赵枫川先后任太行区文联理事，山西省美协副主席，担负了美术宣传战线的组织领导工作。其间，他积极发挥自身的特长，绘制过许多幻灯片，并自制幻灯机，在解放区进行巡回演出，为全国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赵枫川先后调任《华北杂志》社编辑，华北文联美术组组长，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美工室书记、北京画院院长，先后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顾问和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长期担任北京市美术战线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勤勤恳恳埋头工作，团结美术界人士，为发展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了显著成绩。北京画院是周总理授意成立的，目的是要把北京的一些在旧社会游散的老画家团结到党的周围。赵枫川非常领会周总理的意旨，注意在各方面团结各位画家。平时除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外，还经常邀一些老画家到家中做客，探求技艺，为搞好美术统战工作付出了心血。1965年11月，赵枫川赴苏联主持中国美术作品展览。在苏展出期间，困难重重，他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协助下，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展出任务，给苏联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71年秋，他负责着手组织“北京市工农兵美术、摄影展览”。为搞好展览，他深入基层，组织指导业余作者、画家、摄影

工作者积极进行创作，并认真审查评选参展作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北京市工农兵美术、摄影展览”，于1972年3月10日在中国美术馆胜利开幕。这次展览对推动全国美术界的恢复工作起了重大作用。此后，全国各地争相仿效，美术展览如雨后春笋相继而开。赵枫川作为一名画家和文艺战士，在繁忙纷杂的工作中，始终不辍画笔，坚持从事绘画创作，先后创作了不少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北京市美术展览。

赵枫川对学术问题非常严肃认真，登堂入室、探宏觅微，一丝不苟。他主张画家要走出画室，要到群众中去，要到社会中去，要到大自然中去，要走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要反映群众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在技法上，他主张师古而不泥古，要借鉴传统但不能被传统束缚，要推陈出新，要向前发展。由于他深入实际，勤奋创作，勇于探索，一生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其国画代表作品主要有《转移》、《公社生产队》、《太行红柿》、《黄山风景》、《十渡河山水》等；其连环画代表作品主要有《李顺达》、《第一年》、《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等，其中《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获得华北局嘉奖。

赵枫川一生不仅在绘画艺术上勇于探索，而且还追求书法艺术。他先后为河北、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江西、广西、新疆及东北三省等书协书写了许多书法作品，并参加展出。他的名字载入了《中国艺术家辞典》。

“文化大革命”中，赵枫川遭受了左倾错误及“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是，赵枫川以其纯朴的思想感情，坚持党和社会主义必胜信念，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以各种方式与之斗争。他的思想品德和态度，得到了广大干

部群众的同情和敬佩。粉碎“四人帮”后，赵枫川任北京市文化局顾问。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特别是在美术界方面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恢复业务、做了大量的工作。

赵枫川自青年时代参加革命，艰苦奋斗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为革命文艺事业拼搏的一生。他的品德和业绩，倍受同志们和大家的赞扬。

我的叔父赵枫川先生

赵 乃 琛

我叔父赵枫川先生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是我国老一代的书画家。解放后，一直从事书画界的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对我国书画事业的建设、组织、领导和恢复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主要事迹在“中国艺术家辞典”一书有所记载。现在我主要把我叔父的一些不见于书籍记载的日常琐事做一粗略回忆。

大浪淘沙

我叔父自幼爱好绘画，十七岁考入县乡村师范，在校学习期间就经常到大街上画速写写生，所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一次县衙官吏轿马出游，我叔父在路旁速而写之，官吏仪容形态毕见纸上。官吏看后，与己酷似，连连点头称奇。当时我叔父的主任老师郭延钦先生对我叔父关怀备至，鼓励我叔父报考美术学校。1934年我叔父考入“北平京华美专专科学校”，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受到著名画家吴镜汀先生的热情指导。芦沟桥事变后，我叔父困于北平，与邱村王彦才同居一室，钱尽粮绝。王彦才笔利文采，词藻华丽，以撰稿卖文的酬金供二人吃饭。我叔父说：“现在你以文饭我，将来我办

画展将以画饭你”。两位热血青年都非常痛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感叹时局的艰危，决心以身许国。周轳转回到家乡。回家后，我叔父准备投奔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无奈我爷爷奶奶阻力很大，说什么也不让去。当时我父亲也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对我叔父的行动非常支持。二人密商到村西去锄地。天近午，我父亲说，回去吧，家中老小也不能饿死，我在家赡养双亲，你就放心去吧！我叔父泣而涕之，愤然说：“那就拜托哥哥了！”说罢，弃锄而去。

烈火金刚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我叔父锻炼成为了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画笔为武器，进行革命战争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主编画报，自制幻灯，进行巡回宣传演出，有时还乘着夜色到敌伪碉堡脚下散贴漫画和喊话，打击汉奸气焰，鼓动伪军投诚。我叔父还经常把我家作为八路军战士到敌后活动的落脚点。一天晚饭后，有两名八路军战士拿着我叔父的介绍信，住到我家。半夜后，两位战士对我父亲说，他们要去执行任务，不必给他们留门了，说完就出去了。第二天就传说邻村的一个汉奸被枪毙了。尸体挂在院内的树上，脚下还贴着一张告示。原来这个汉奸是个两面派，以给八路军办事为幌子，搜刮民财，向百姓摊派布匹，中饱私囊，还暗地里勾结日寇，出卖抗日志士，被这两位八路军战士奉上级命令在夜间给处决了。（据父亲说）。高邑城解放的前一天晚上，我家又住进六名八路军，到后半夜，就束装出发了。到了天明，街头大哗，说高邑城解放了。原来，这六名八路军战士就是参加解放高邑城的。

我叔父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次，我叔父因工作需要，戎马路过家乡，住在家里，背着一个小薄棉被，还有满身虱子。我婶子说：“看你们八路军，蛤蟆老鼠的，白天睡觉，黑夜窜游，生了虱子也不知道痒痒，盖这么个小薄被子也不知道冷，还能成了什么大事！”我叔父风趣地说：

“怎么成不了大事，我们八路军个个都是师（虱）长，团长（晚上睡觉冷，把身子团在一起。）”

我叔父还具有高度的群众观点。日寇投降后，八路军组织群众扒铁路（防国民党北上）。我母亲对我叔父说：“看你们共产党，净使些笨办法，让百十号人抬一根铁条。”我叔父听后，哈哈大笑，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这正是共产党的伟大，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动起广大的民众。没有共产党组织广大民众起来抗战，能撵走小日本儿吗？”

我叔父还非常关怀家乡的土改运动，发动村里的贫雇农组成了农会，对反动地主阶级展开斗争。1947年我叔父到涉县等地参加土改运动。后来，村里的地主复辟势力气焰嚣张，扣押了农会主席史计言。我叔父听说后，不辞路途遥远，星夜赶回家乡，再一次发动群众，扑灭了地主复辟的气焰，使土改运动归于正途。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叔父作为一名画家和文艺战士，始终不辍画笔，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在艰苦的环境里，仅用一支铅笔头和一些草纸，画了数以千计的速写和写生。这些写生稿有的是画的八路军战士团结战斗生活的，表现了他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的画的是当时战争离乱下的老百姓的生活，表现了他们刚强不屈、忠厚实在的精神面貌；有的是记录了激烈的战斗场面。有一次，

我叔父他们的一支工作队和敌人发生了遭遇，战斗打响了，子弹从我叔父头顶上呼啸而过。就在这样的生死关头，我叔父拿出画笔记录下了那激烈精采的战斗场面。这些写生稿是当时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们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为重要是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后来，我叔父把这些写生稿整理成册并写了序言。72年我到北京，我叔父把这厚厚的一本写生稿拿给我看，并给我解释哪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画的。后来。听说我叔父把这些珍贵的写生稿捐赠给了山西博物馆。

赤胆忠心

我叔父对祖国、对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一片赤胆忠心。解放后，百业待兴，我叔父积极拿起画笔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抗美援朝时期，我叔父乘探亲的机会在村中的墙壁上画了讽刺美国侵略者马歇尔的漫画。在党和国家恢复和组织生产建设时期，我叔父画了一系列反映农民发展生产的组画。记得其中有一幅，上面画了农民新买了一部新式步犁，正在试着用新犁耕地，上面题道：“入土稳、扶着轻，犁起地来一阵风……。”表现了农民翻身后的愉快心情，为政府推广新式农具的号召助兴。在党号召农民互助合作时期，画了连环画《劳动模范李顺达》，在说明词中写道：“劳动模范李顺达，家住在山西平顺县，他领导全村组织互助组，订的计划真完善……。”在合作化时期，我叔父画了国画“公社的生产队”。一九五七年我叔父奉命到临城、内邱、赞皇等地整理抗战史料，途经自己曾经战斗过的石柱山区，看到已回到祖国和人民手中的山川的雄伟壮

丽景象，感慨万千，当即写生，回家后整理成画，上面题道：“石柱山为余抗日时期所在地，今又重游，山峰依然矗立，气势巍峨，回忆当年，颇为有感，以写生志之。福印兄存。”一九六二年我叔父回来探亲，看到三年经济困难后，农村恢复起来的大好形势，即时赋诗一首：“村中无处不开荒，堤前堤后皆牛羊，遥望西山今犹在，风景依旧是故乡。”我叔父对毛主席十分敬佩，经常对我父亲和母亲说：“毛主席是一位举世以来最伟大的人物。”我叔父还十分关心国家的历史文物，一次，回家探亲，见我村西岗的取土坑里有好多陶罐和瓦片，就把它们搬回家中。我母亲见后说：“你是在外面挣钱的，不缺吃不缺用，还希罕这些破瓦渣？”我叔父笑着说：“这都是国家的宝贝，见了宝贝怎肯不拾。”之后我叔父把这些文物携带回京交给了国家。我村的广济桥是清代早期修建的。77年我叔父回家时，不顾年事已高，掘开冻土，把广济桥碑记全部抄录下来。解放初期，我叔父在农村下乡，见一所破庙里贴着一张画，已是烟熏火燎，虫蛀鼠咬，残破不堪。我叔父一看，是清代一位著名画家所作，是一件很珍贵的历史文物，就以水湿壁，把它揭了下来，并加以修补装裱，妥为保存。我叔父还对那些盗卖国家文物的投机分子十分痛恨，认为这些人是国家的蠹虫和耗子，是与汉奸无异的。我叔父经常教育子女要热爱祖国，要有民族自尊心，不能崇洋媚外，要有中华民族的傲骨和气节。七二年西德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展览会向参观者每人赠送一只印着红黄兰齿轮的塑料提兜（红黄兰是德国国旗的颜色）。当时一些不文明的观众争着抢要，把队伍都挤乱了，有的甚至再二再三要了好几只，当时我也得到一只。回来后我把提

兜给叔父看，并把要捉兜的现场情况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遍，我叔父听后认为这是很不文明的现象，是一种有辱国格的行为，并说：“象这种印着人家国旗颜色的东西，给我我还不希罕要，别说抢了！”我听后很觉面赤。

团结同志 尊重师长

我叔父广为交游，团结同志，尊重师长，关怀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北京画院是周恩来总理授意成立的，目的是要把北京的一些在旧社会游散的老画家团结到党的周围。我叔父非常领会周总理的意旨和用心，注意在各方面团结他们，平时除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外，还经常邀一些老画家到家中做客，和他们探讨技艺，即席书画。我叔父接人待物非常和蔼。五五年我叔父与吴静波先生回老家写生采风体验生活。一天中午，我母亲给他们摊的咸食，我父亲劝吴静波先生多吃一些。吴静波先生是南方人，没吃过咸食，逊谢道：

“我已吃了两个饼子了，不吃了。”我叔父风趣地说：“这叫闲（咸）食，闲了的时候才吃，现在咱们工作不忙，有闲吃饭，就应该多吃一些。”说得我父亲和吴静波先生都哈哈大笑。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老舍先生的生活很艰苦，而且还要绞尽脑汁，构思作品。我叔父深知艰苦的脑力劳动，没有很好的补养不行，就特意批了一张条子，照顾了老舍先生15斤猪肉。老舍先生很是感激。1964年，我叔父到南京上海等地参加鲁迅先生墓地的迁葬仪式。在那里与南京画院、上海画院（当时全国只有三所画院，即：北京画院、南京画院和上海画院）的钱松岩、唐云等一些老画家促膝谈心，交流技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这些老画家进京办事时，经常到

我叔父家中作客。还有山西文联的一些老同事，与我叔父都是莫逆之交，也经常到我叔父家中作客。吴镜汀先生是我叔父学画的指导老师。我叔父对其非常尊重，亲自编辑他的画集并为《吴镜汀作品选集》撰写前言。郭延钦先生是我叔父青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我叔父在外工作，经常念及他老人家。1977年春节回老家探亲，亲自登门拜访郭延钦先生，同郭老师合影留念，并亲笔书画赠送他老人家。我叔父对师长的尊重和对同志的关怀，赢得了人家对他的敬重和爱戴。吴镜汀、傅抱石、钱松岩、胡佩衡、黄胄、唐云、秦仲文、于非闇、汪慎生、王雪涛、惠孝同、陶一清、邓拓、郭沫若、陈丰丁、白雪石等诸多画家和学者，都对我叔父有亲笔赠书或赠画。

游弋艺海

我叔父对于学术问题非常严肃认真，登堂入室、探宏觅微，一丝不苟。他主张画家要走出画室，要到群众中去，要到社会中去，要到大自然中去，要走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要反映群众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在技法上，他主张师古而不泥古，要借鉴传统，但又不能被传统所束缚，要观察自然，传授感受，要不断创新求异，要推陈出新，要向前发展。他并且身体力行，一生画了无数的写生，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他的艺术创作思想在62年他为《吴镜汀作品选集》一书所写的前言中可略见一斑。他说：画家对于古代的东西要“吸取丰富的传统技法”“打下稳固的基础”以“丰富艺术表现能力”。但是在表现新事物面前，如果旧有的东西不适应了，“宁可扔掉过去的技法，从头来，也在所不